社區意識對社區營造行為影響之研究：以台灣農村社區為例

郭彰仁*

（收件日期：103年01月28日；接受日期：103年12月16日）

【摘要】

在講求效率與政府經費逐年縮減的狀況下，推動社區居民自發的參與環境改造可以讓社區環境永續經營，並間接促進地區的發展。有關社區居民參與社區營造，除了表現出對社區環境的關懷，也可能與其社區意識有關。因此本研究以農村社區居民為研究對象，旨在透過文獻探討，選取適合之社區意識量表，並檢視在台灣的適用性。其次為驗證社區意識對居民在參與社區營造計畫時對參與行為的影響。研究結果提出適用於台灣的社區意識量表，同時也驗證了社區意識對居民參與行為的影響。同時在農村社區中影響社區參與的社區意識構面最重要的為「社會連結」；其次是「場所依附」；再其次是「需求滿足與影響力」。研究結果可以作為政府推動社區營造相關計畫之參考。

關鍵字：社區意識量表，社區營造，台灣農村地區，社會連結，場所依附

*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休閒遊憩系，通訊作者
Departmen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聯絡地址：632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64號、電話：（傳真）：093541300(05-6315887)
電子郵件地址：changzen@nfu.edu.tw
感謝三位匿名審查者的寶貴修正意見及國科會的經費補助(NSC-99-2410-H-150-001)。

The Influence of Sense of Community on Residents' Community Empowerment Behavior –A Case Study of Rural Community in Taiwan

Chang Jen Kuo*

(Date Received: January 28, 2014;Date Accepted: December 16, 2014)

Abstract

Base on an efficient society and the budget of government downsizing, promoting community resident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actions would help the community environment management to be more sustainable and indirectly leading the local development. Concerning community environment, and sense of community might be correlated with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community empowerment behavior. The purpose of study is to find a sense of community scale of Taiwanese population, and to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nse of community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behavior. The findings provided support for the fitness of sense of community scale in Taiwan; and provided sense of community significantly impacte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behavior; and in the factors of sense of community that impacte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behavior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ject, most important is "social bonds", second is "place attachment", third is "needs fulfillment and influence". These findings could be used to improve the community empowerment policies of government.

Keywords： The Sense of Community Scale, community empowerment, rural areas of Taiwan, social bonds, place attachment

壹、前言

台灣自1990年代政府開始致力推動社區營造政策，有關社區意識的概念大量出現在政策文件與相關研究中，但是卻缺乏明確的理論與操作性界定，使得它難以運用於政策分析及實務中（黃源協、蕭文高、劉素珍，2007）。在1990年代爆發社會力的風潮後，一連串社區營造運動的推波助瀾，帶給政府擬訂新社區政策的動能，從1994年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成形，2002年「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新故鄉社區營造」子計畫，以及2005年的「臺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政策理念逐漸從舊有著重在建設層面，轉移至社區參與及共識凝聚（黃源協等，2007）。以社區意識(sense of community)為主的實證與操作性研究，亦在此時受到研究者的關注（例如，侯錦雄及宋念謙，1998；林瑞欽，2000；郭瑞坤及王春勝，2004）。過去國內學者在社區意識的量表建立上大多是參考林瑞欽(2000)所發展的量表，在實證上較為缺乏，且多數採取探索性因素分析，作為量表之建構。最早將社區意識建構成為可度量的問項，是美國心理學家Glynn (1981)利用120個「Likert-Type」問項，測度社區居民對社區環境認知的描述同意程度，並利用分數總加將所得觀察值區分成不同社區意識群。Glynn (1981)提出「心理學社區意識」（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的PSOC社區意識量表，讓社區意識相關研究進入了可度量的領域。之後，McMillan與Chavis (1986)提出了一個清楚明確的SOC (sense of community)理論模型，這是其他研究者所公認的，之後的將近30年，McMillan與Chavis的概念仍是大部分SOC研究主要的理論參考。但這些研究在台灣的適切性，是否因受測對象不同而有所差異？另一方面，在居民本身，由於環境意識的抬頭，對於環境的改造，從以往公部門的主導，也逐漸轉變為居民自發性的參與環境改造。居民參與的環境改造行動中除各縣市政府補助的社區營造相關計畫之外，在中央政府的政策上過去最多計畫的是「創造城鄉新風貌」的政策，目前則是「農村再生計畫」，在政策的演變過程中，計畫名稱或許不同，但其最終的目的都在改善台灣的生活環境品質。

台灣從過去文建會（已改制為文化部）、內政部營建署到最近農委會水保局等政府單位，皆致力於社區營造工作，水保局推動之農村再生工作主要在於促進農村活化再生，提升農村整體發展，恢復農村居民在地居住尊嚴，以及建設富麗新農村之目標。農村再生係因應整體農村發展之需要，以現有農村社區為中心，強化由下而上的共同參與制度，建立農村整體再生活化，並強調農村產業、自然生態與生活環境之共同規劃及建設，注重農村文化之保存與維護及農村景觀之綠美化。因此要如何促進農村居民參與其自身環境改造，是相當值得研究的議題。此外近年台灣的實證社區研究，多數研究係透過變異數分析、相關係數與多元迴歸分析方法以小空間範疇為研究區域進行量化檢證（黃源協等人，2007；郭瑞坤等人，2007）。過去本土研究多是小範圍之研究，雖然小範圍研究可避免因研究空間過大而產生的不確定特定空間相關因素對研究分析的干擾，但其研究通常因特定研究空間的侷限性，而致使其研究結果僅能描繪某個特定空間，無法有效地推論台灣整體現象，或形成有效的政策建議（李俊豪，2010）。因此，本研究

以台灣農村社區為研究空間，透過全台灣農村樣本的調查，以建立一個可以反映台灣本島社區的推論與結論，而非僅將研究焦點投注於某個特定空間。並以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分析其因果關係，期能藉此提升對台灣居民社區意識之認知。另外本研究重點在瞭解過去社區意識量表的建構歷程，並尋找出適合台灣地區居民在從事社區環境改造時可用的社區意識量表。並進一步瞭解社區意識各構面對社區參與的影響與影響的輕重，據以提出相關建議。

貳、文獻探討

近年來國內外民眾參與的相關研究相當多，社區意識被認為是影響民眾參與的主要因素之一。國內相關研究主要有郭瑞坤及王春勝(2004)、侯錦雄及宋念謙(1998)、林暉月(2001)的實證研究，這些都證明社區意識影響社區居民的參與行為。國外學者Chavis (1990)也證實社區意識對社區參與的影響；William與Partick (1989)亦證實社區意識對於政策參與的影響。

一、社區參與的概念

社區參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一詞與「民眾參與」(public participation)或「市民參與」(citizien participation)有類似的指涉。民眾參與或市民參與是源自於政治學的「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用法，是指社會大眾任何自發性的行動，以影響政府的政策與執行（郭瑞坤、汪夢怡、邱鴻遠，2006），此外Renn, Webler,與Wiedemann (1995)將民眾參與定義為「集合政府、民眾、利害關係人、利益團體等，針對特別議題或決策進行溝通與意見交換的論壇」；後來其範圍則擴大至社會的各層面，可小至參與日常生活中與群體有關的公共事務，大至參與政府的政策制定或執行過程。所以，我們可以說社區參與就是以參與社區事務為範圍的民眾參與。

美國「公民實踐網絡(Civic Practices Network, CPN)」即提倡現代公民應該要積極地參與公共事務，建構政府與民間共同合作的模式，以創造社會的最大福祉。而在民眾參與的整體概念中，社區的參與為其中最基礎的一環，也是相當便捷有效而又切合民眾本身權益的途徑；Osbome與Gaebler (1992)指出，由社區自行參與的公共服務，既省錢、又有效率，將會是未來從事公共事務的主流（劉毓玲譯，1993）。美國西北大學都市計畫及政策研究者John Mcknight也以其數十年來擔任社區組織者之經驗指出：社區比起政府及市場而言，能提供更快、更有效率的公共服務，而且比較瞭解問題並能解決問題，也較有彈性、創意及關懷（劉毓玲譯，1993）。

Paul (1987)將社區參與定義為一個積極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獲益團體以一個可增

進它們福利的觀點去影響一個發展計畫的方向與行政，這些福利包括收入、個人成長、自我依賴或是其它它們喜愛的價值。因而一個社區或社區成員的社區參與，不僅是貢獻勞力或金錢而已，應是社區成員投入計劃和決策之中。

Sheng (1989)認為社區參與是在某特定地區有目標的結合社區居民和行動之過程，能提升社區生產力和居民自我認同。然而這意味著在官方與社區之間的權力共享。蔡宏進(1985)認為社區參與是一種主要的社區行動方式，社區居民參與各種社區中的活動，表示其對社區事務的關切與興趣。而社區參與之過程對參與之個人而言，也是一個最佳之學習與教育。社區參與的具體行動則區分成五種：1.捐助財物；2.擔任社區服務工作；3.關心、認識、發掘與引導解決社區問題；4.從事社區的發展工作；5.參與社區事務與活動（吳宜蓁，1996）。

二、社區參與的方式與衡量

以往針對民眾參與程度之相關研究，並未有統一通用的度量方式。研究者多依相關相關理論或文獻自行發展評估民眾參與程度的量表。Ohmer與Beck (2006)參考Itzhaky與York (2000)的研究透過六個尺度來衡量社區居民參與決策的情形，這六個參與尺度依序為：(1)未參與；(2)扮演被動角色；(3)傳達資訊；(4)擔任工作人員或委員會成員；(5)部分參與規劃、決策與執行；(6)完全參與規劃、決策執行。另外1989年Bagnall對於成人參與社區教育活動進行研究時，將參與程度分為三個層次（沈桂枝，2001）：(1)出席(presence)：指參加相關的活動舉辦現場，但不參加相關社區活動的規劃與執行過程；(2)涉入(involvement)：除了參與活動外，對於社區事務尚能表示意見與看法，同時與社區成員產生較高的互動行為；(3)控制(control)：指社區居民積極介入社區事務的處理與運作，並意圖控制、操控與主導其運作。李光中及王鑫(2003)引用世界自然保育聯盟(The World Conservation Union, IUCN)中對於社區參與的說明，將社區參與的類別與等級區分如下：(1)告知(Informing)：指個人或團體單向獲知相關資訊，且無法參與及改變既定計畫；這是掌權者「由上到下」的政策制定與溝通的方式，著重在操作與宣傳，目的在於說服別人接受既定的觀點，這是最低層次的參與方式；(2)諮詢(Consulting)：指掌權者除了告知之外，亦會向地方社區、權益關係人及相關組織徵詢意見，並考慮將這些意見納入計畫修訂；(3)協議(Deciding together)：指與相關的個人或團體一同討論，使其成為決策過程的一份子；(4)共同行動(Acting together)：指在決策的過程中，相關的人共同分擔與執行、分工合作，並共同承擔責任。夏鑄九、林鎏與顏亮一(1992)在研究民眾參與古蹟保存計畫時，將參與程度分為四個層次，由參與程度較低至較高分別為：(1)通知/告知；(2)計畫說明；(3)決策參與；(4)規劃與執行參與。郭瑞坤、徐依鈴、張秦瑞、沈逸晴(2013)採用Plummer 和Taylor (2004)所提出之社區參與階梯理論與郭彰仁、郭瑞坤、侯錦雄與林建堯(2010)的社區參與程度類別相結合，以告知、出席、討論決策、規劃執行作為「社區參與程度量表」的依據。

本研究考量農村再生計畫中的社區參與與環境改造為多數，故以「從未參與」、「出席相關活動」、「提供意見」、「參與決策」、「實際規劃執行」，作為衡量社區居民社區參與之程度（郭彰仁、侯錦雄、郭瑞坤、歐雙磐、謝政勳，2009）。此外在衡量社區參與時，過去研究多會以參與頻率與參與時間來衡量社區參與程度的指標(Ohmer & Beck, 2006；Perkins & Long, 2002)。故本研究在衡量參與行為時亦加入參與頻率與參與時間。參與頻率是指單位時間內某事件重複發生次數的度量，因此參與頻率是指在特定時間範圍內，民眾以各種方式與程度參與社區特定事務的次數。參與時間指的是民眾在社區參與上所花費的時間。

三、社區意識的概念

社區意識(sense of community, SOC)為心理學與社會學領域中影響都市發展的最重要概念，它是同一組織環境中社員之間的歸屬情誼 (Doolittle & MacDonald, 1978)。此種歸屬感係來自社區居民具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服務、共同的問題、共同的需要、共同的居民環境而產生的共同意識（黃富順，1994；侯錦雄與宋念謙，1998）。它是同一組織環境中社員之間的歸屬情誼，也是一種存在於個人與個人或個人與團體之間相互依戀共存的情感表徵，彼此享有共同的信念及需求，並能一起達成彼此間的承諾與義務(Doolittle & MacDonald, 1978; McMillan & Chavis, 1986)。因此，歸納各學者之意見，社區意識具有下列幾項意涵：1.社區意識是社區認知的表徵：個人對環境的知覺，是以感覺為基礎。此知覺是經由認知的過程轉化成為個人的認知結構，個人對社區的認知結構則反映在對社區的環境認知層面(Ittelson, 1978)。就認知心理學的觀點，社區意識是個人對所處的社區，經由感覺、知覺而建構一套涵攝情意因素的認知結構系統（蔡祈賢，1996）。個人對社區的認識、記憶、知覺、情感以及評價都將有其個別差異。然而當這些個別差異逐漸減少時，就顯示社區居民對社區較具有一致性的態度，如此將會增加個人對社區的認同、參與、親和與關懷，自然容易凝聚較高的社區意識（Unger & Wandersman, 1985； 林瑞欽，1994）；2.社區意識是對社區的情感累積：不論是刻意營建或長時間自然形成的社區意識，一旦社區居民關懷社區利益、捨不得離開社區、對社區有漸明確的認知圖像或象徵意義，社區意識便形成。社區意識是居民對社區態度的情感認知結構，經由認同感產生一體的感覺，這地方歸屬感可以激發居民的社區情感（黃富順，1994）。個人對所處社區情意層面的情感累積將代表個人對社區情感的付出以及所花費的心血，而此情感的累積，包含了「鄰里互助感」(sense of mutual aid)，也就是一種存在於鄰里之間的一種相互幫忙的信賴感、個人對所在環境的依戀感(attachment to place)、以及心理層面的安全感(emotional safety)和共同價值的經驗分享等等（侯錦雄及宋念謙，1998）；3.社區意識是對社區事務的參與：個人對所處社區活動或組織的參與表示其對社區態度的實際行為呈現，其中參與程度又與個人所能認知到其可支配或可控制、使用的權力(perceived control and empowerment)有明顯的關聯。另一方面，參與亦

被證實為削減社區衝突發生的有效方法，不但可以增加人際之間的情感連結，更可以凝聚對社區問題的共識 (Rappaport, 1981)。4.社區意識是對社區的認同感：社區的認同(identity)是居民樂於參與社區的主要心理因素，有此作基礎，個人才能誠心樂意參與社區活動，並為社區盡力（黃富順，1994）。李俊豪(2010)則是簡單定義社區意識是個人對於其居住社區及居民的情感。胡志平與林帝佑(2013)將社區意識定義成「社區居民對社區具有的歸屬感、認同感、責任感及情感關懷。社區居民具有共同的利益、服務、問題、需要而產生共同意識，並藉由擁有共同意識帶動居民的自發性積極參與社區事務，來塑造良好經營管理模式。

四、社區意識的測量

最早將社區意識建構成為可度量的問項，是美國心理學家Glynn (1981)利用120個「Likert-Type」問項，測度社區居民對社區環境認知的描述同意程度，並利用分數總加將所得觀察值區分成不同社區意識群。Glynn (1981)提出「心理學社區意識」的PSOC社區意識量表，讓社區意識相關研究進入了可度量的領域。之後，McMillan & Chavis (1986)提出了一個清楚明確的SOC理論模型。這是其他研究者所公認的。之後的將近30年McMillan與Chavis (1996)的模型仍是大部分社區意識研究主要的理論參考。McMillan與Chavis (1986)提出社區意識可能可以看做四個成分的組成（詳表一）。第一個成分是成員身份(group membership)：個人共事關係的歸屬感或分享的感覺；第二個是具有影響力(influence)：重要性的感覺與改變團體與團體影響它的成員；第三個是需求的統整與達成(integration and fulfillment of needs)：幫助一個團體提供它的成員刺激他們在團體的參與；第四個是共享的情感連結(shared emotional connection)：成員已經分享或將會分享歷史、司空見慣的事、一起相處與相同經驗的承諾或信仰。但是McMillan (1996)重新整理與命名這四個成分為精神(spirit)、信任(trust)、交換(trade)與技藝(art)。他重新定義了「社區意識」，視其為一個歸屬在一起的精神、一種權力結構能被信賴的感覺、一種互相獲利的社交經濟，以及如藝術般維持在一起因而獲得共同利益的經驗分享。

事實上，SCI (Sense of Community Index)社區意識衡量指標 (Chavis, et al., 1986; Perkins, et al., 1990)最初是設計來研究McMillan與Chavis (1986)的四個構面的模式。後來SCI也被修改為一個具有三個構面的量表，Long與Perkins (2003)利用驗證性因素分析(CFA)重新修正後，提出新的SCI量表是由三個構面所形成，分別是互相關心(mutural concerns)、社會關係(social connections)、社區價值(community values)。此一量表證明在配適度上優於McMillan與Chavis (1986)四個構面的模式。Tartaglia (2006)進一步修正後，提出義大利的社區意識量表Italian Sense of Community Scale (ISCS)。作為義大利社區意識的衡量指標。這個量表一開始包括18個問項經探索性因素分析後刪除3個問項，由三個構面組成，分別是場所依附(Place Attachment)、需求滿足與影響力(Needs Fulfillment and Influence)、社會連結(Social Bonds)。在配適度上優於McMillan與Chavis (1986)四個構面

的模式。

此外Md Sakip, Johan, Abdullah, 與Mohd Stalleh (2013)引用McMillan與 George (1986)提出的四個構面成員歸屬感(membership)、影響力(influence)、需求滿足感(needs reinforcement)及情感連結(shared emotional connection)測量馬來西亞居民的社區意識，顯示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在Long與Perkins (2003)所作的社區意識量表中，最初設計了四個與場所依附有關的問項，但是最後把他們排除在量表之外，因為他們認為與社區意識沒有重大關係。Tartaglia (2006)卻認為社區意識應該包括與實質地理環境的連結，因為兩個原因。第一個，在實證上社區的組成特性和社區意識的發展與維持有關(Brodsky, et al., 1999)。第二個原因是比較合乎理論與更好的切題性。事實上人與居住社區之間的實際連結（需求滿足與影響力）確實影響使用社區資源的實質效益（閒晃、到公共場所、工作）。如McMillan與Chavis (1986)所提出的論點，認為這個連結可能會促進社區意識的發展。場所依附似乎受到對實質環境的知識與熟悉度影響，居住時間與閒晃的習慣影響對社區的瞭解。同時這些讓人們認識自己的鄰里以及習慣於他們居住的實質地理區域。雖然傳統的地理區域觀點在理念上較不受歡迎，或是認為其定義過於狹隘，但就實際應用上來說許多社區研究的個案還是以地理區位為主（黃協源等人，2007）。在本土相關實證研究上多數仍以地理區位來界定社區如侯錦雄與宋念謙(1998)、林暉月(2001)、郭瑞坤及王春勝(2004)等人的研究。

通常對地方的認同可以解釋為歸屬感或擁有感，簡而言之，可稱之為認同自己是地方的一份子且強烈地願意為其付出心力，維持其持久性（呂怡儒，2001）。「地方」並不只是一個單純的物理空間，僅容納了自然物體，可經由自然物體之相對位置關係而界定，並承載人們對於一個空間的歷史、經驗、情感、意義與符號（原友蘭及劉俊志, 2004）。因此，地方必然包含了某些意義，像是地域、地方提供的機能性，使用大眾的經驗以及體驗與知識，或是公共符號的意義等等。Warzecha與Lime (2001)也指出場所依附感大部分被歸納為個體對地方的感受，且包含情感象徵性的傳達。換言之，場所依附感是屬於一種感情的歸屬，使用者感覺到自身與地方結合之程度，是對於環境的情緒及環境使用者所代表的一種象徵及感受。

基於以上概念，因為，本研究牽涉到實質環境的改造行為且研究針對社區的範圍仍是以較狹義的地理環境劃分，本研究也認為在台灣的社區絕大部分仍以行政區為劃分。因此在探討台灣社區的社區意識時應包含與實質地理環境的連結，所以場所依附應為一重要影響因素，因此在社區意識的量表採用，以Tartaglia (2006)提出的ISCS量表做修改〔調整社會連結的(2)(5)這兩題反向題為正向題，以及調整部分語句但意思一樣〕，作為本研究在社區意識量測的依據。

五、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之關係

過去的研究，社區意識也被證明與政策參與及社區參與行為有正相關 (Hughey, et al., 1999)，而Davidson與Cotter (1986, 1989)以McMillan與Chavis的模型修改問項（但仍包括四個影響因素），證明了社區意識與居民的投票以及與與公共部門之間的聯繫有顯著正相關(Peterson, et al., 2006)。國內相關研究主要有侯錦雄與宋念謙(1998)、林暉月(2001)、郭瑞坤與王春勝(2004)等人的實證研究，說明了社區意識會影響社區居民的參與行為。另一方面黃源協等人(2007)的研究也證實社區參與與社區意識之間的關係。國外學者Chavis (1990)證實社區意識對社區參與的影響；William與Partick (1989)亦證實社區意識對於政策參與的影響。陳香妃、張金鄂與葉毅明(2007)以集體行動看社區意識與管理制度對公寓大廈管理維護之影響，也證實了社區意識對管理維護的影響。此外鐘政偉、賀力行、謝宜伶與陳恒敦(2007)的研究發現居民地方認同感、社區參與與居民態度與文化創意產業的推動呈現正向關係。黎弘煌(2011)也發現「社區意識」愈高者其「鄰里關懷」的程度愈高，且居民居住在「鄉村型社區」者之「社區意識」與「鄰里關懷」要高於居住在「半都市 型社區」及「都市型社區」者。張凱智與宋秉明(2010)從文獻研究觀點：印證社區意識對民眾參與正相關，夥伴關係高會產生干擾；從實務角度觀點：可透過民眾參與來凝聚社區意識，但夥伴關係無干擾效果。胡志平與林帝佑(2013)研究發現，客觀管理維護績效也會因為社區凝聚力夠強，居民較願意犧牲自己的部分時間，主動輪流投入社區管理維護事務，並集結起來參與社區會議，共同討論社區需決議事項，進而提高整體維護績效之成果及參與程度，透過居民的共同參與和情感交誼也將會促進社區意識，也就是說這幾個變數是相互影響、相輔相成的因素。因此社區意識與參與實為相互影響之變數。Clampet_Lundquist (2010)的研究也指出居住最少超過五年的社區意識較高同時也有更多的社區參與。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驗證性因素分析，探討社區意識量表之信效度以及適切性。另外本研究認為社區意識是影響民眾社區參與的主要因素之一。國內相關研究主要有侯錦雄與宋念謙(1998)、林暉月(2001)、郭瑞坤及王春勝(2004)等人的實證研究，皆證明了社區意識會影響社區居民的參與行為。另一方面黃源協等(2007)的研究也證實社區參與與社區意識之間的關係。國外學者Chavis (1990)證實社區意識對社區參與的影響；William與Partick (1989)亦證實社區意識對於政策參與的影響。陳香妃等(2007)以集體行動看社區意識與管理制度對公寓大廈管理維護之影響，也證實了社區意識對管理維護的影響。此外鐘政

表1 社區意識構面相關研究

研究者	構面（或命題）	內容或測量變項
McMillan & Chavis (1986)	1.成員身份 (group membership) 2.具有影響力 (influence) 3.需求的統整與達成 (integration and fulfillment of needs) 4.共享的情感連結 (shared emotional connection)	1.成員身份： 是指個人感受到社群內其他成員的共識並接受後，所產生的認同行為。成員關係主要由五個子構面所組成：(1)邊界(Boundaries)：透過象徵（譬如語言、穿著、儀式）作為成員或非成員的辨識方法。當社群的邊界愈明顯時，非社群成員會較不受到尊重並且容易受到指責及處罰; (2)情感安全(Emotional safety)：當邊界確立後，成員知覺在社群中的活動與互動是安全的，進而提高個人參與; (3)個人投入(Personal investment)：成員在金錢以及勞力上的貢獻，進而為促進會員關係，增強社群意識; (4)歸屬感與認同感(Sense of belonging and identification)：成員感覺自己屬於社群，並且接受社群的價值與象徵; (5)共有的象徵體系(A common symbol system)：社群的名字、logo、語言、穿著，以及儀式等，這些象徵可促成員間的團結感。 2.具有影響力： 指的是權力的關係，由兩個作用力組成：(1)拉力是指個人為了獲得得權力而加入社群(2)推力則是為了達到社群的團結，透過權力迫使成員順從。McMillan&Chavis認為「影響力」是社區意識中最重要的因素。 3.需求的統整與達成： 這裡所指的需求，不是生活中的必需品，而是指當人們衣食無虞後所產生的其他需求，其中包括個人的價值判斷。整合與滿足需求的意思就是，社群中的人們體認到自己與其他社群成員相互依賴，進而會順從他人的期望。 4.共享的情感連結： 與社群成員分享自己的故事。McMillan&Chavis認為此種互動關係可幫助社群成員間相互瞭解，有助於社群的發展。
Long & Perkins (2003)	1.互相關心 (mutural concerns) 2.社會關係 (social connections) 3.社區價值 (community values)	1.互相關心的測量變項為： (1)我的鄰居和我對這個街區的需求一致; (2)假如這個街區有困難，住在這裡的人會幫忙解決; (3)一般而言，你們的街區的人在他們能力所及時會照顧別人以及幫助別人或是各自做自己的事？ 2.社會關係的測量變項為：(1)我可以認得大部分居住在我同一個街區的人; (2)我的鄰居很少人知道我; (3)我無法影響這個街區變成怎樣。 3.社區價值的測量變項為：(1)你認為感受到居住在你這個街區的人有沒有社區意識是重要的、一點點重要，或不重要？; (2)你覺得居住在你社區其他人的社區意識是強烈或很低或一般？
Tartaglia（2006）	1.場所依附 (place attachment) 2.需求滿足與影響力 (Needs Fulfillment and Influence) 3.社會連結 (Social Bonds)。	1.場所依附的測量變項為：(1)我喜歡我居住的社區; (2)這是一個美麗的社區; (3)當我旅行時我會驕傲的告訴別人我住在哪; (4)我覺得我是屬於我居住的社區; (5)我喜歡我住的房子; (6)在我居住的社區我覺得安全。 2.需求滿足與影響力的測量變項為：(1)我住的地區提供我機會去嘗試不同的事物; (2)如果社區能組織起來就能達到所要達成的目標; (3)假如我需要幫忙，這個社區能夠提供我幫助。 3.社會連結的測量變項為：(1)我住的社區裡居民是客氣有禮貌的; (2)我不喜歡我的鄰居; (3)如果有人需要幫助，社區裡的人會願意提供幫助; (4)對於社區的規定我願意尊重; (5)在這個社區中很難可以與其他人建立人際關係; (6)假如搬離這個社區我會損失很多。

偉等人(2007)的研究發現居民地方認同感、社區參與與居民態度與文化創意產業的推動呈現正向關係。因此本研究將探討社區意識對社區參與行為之影響，亦即探討社區意識三個構面（場所依附、需求滿足與影響力、社會連結）與農村社區居民度社區參與之關係。並進一步探討社區意識的組成因素中如何影響社區參與，並據以提出建議（詳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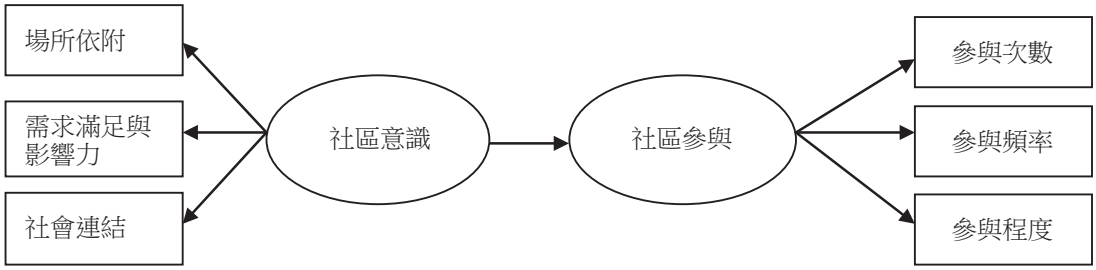


圖1 研究架構圖

二、資料蒐集方式

本研究問卷的測量在社區意識的部分採李克特七點量表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社區參與則為五點量表詢問其參與程度、參與時間、參與頻率。研究自2011年3月1日至3月30日進行問卷預試，預試問卷總計發出200份，扣除10份廢卷，共回收190份。預試結果採用內部一致性效標法與項目總分相關法進行項目分析，依此兩道程序檢驗，以確保問項的信度、效度。並測試問卷的語意，修改受訪者不清楚的問項，過程中並無刪除或修改問卷題項。

正式問卷以全台農村社區（參考台灣社區通網站http://sixstar.moc.gov.tw/中位於非都市計畫區之社區）為樣本進行抽樣，抽樣方式因具有社區名單，且為確保每一個網站內位於非都市計畫區之社區皆能具有相同機率，故在社區的部分採取隨機抽樣，抽出社區後，先詢問受訪意願後再發放問卷，如未獲同意則再隨機抽取社區，總計發出40個社區，這40個社區分別為：宜蘭縣仁愛、二龍、礁溪、拔雅、頂埔、賢文、惠好、員山、壯圍、金蘭、思源、二結，花蓮縣壽豐、鳳林、榕樹，台中市潭子、建興、竹仔坑、大里建民、部子、海墘、金星里、聯合，台南市公館、竹埔、李子園、田寮、汴頭，屏東古樓、東寧、玉水、振豐、新豐，高雄市內豐、統嶺、竹寮、永安，雲林縣口湖、港尾、海豐等社區。問卷發放之社區並未限定為參與水保局農村再生計畫之社區，因社區營造除了水保局、文化部、客委會都有可能補助社區執行相關計畫。

問卷的發放則請求社區組織幹部及研究助理協助進行問卷的發放，發放的對象則採取便利性取樣。本研究之問卷發放方式，採寄發或親自送達並對社區組織幹部說明，問

卷發放時間計從2011年5月1日至6月30日，總計發出800份問卷，回收650份，扣除廢卷後共得到有效問卷615份。由於本研究使用SEM作為主要的分析工具，Bagozzi與Yi (1998)認為在使用SEM進行分析時，樣本最少必須要超過50，最好達到估計參數的五倍以上。Hair et al. (2006) 則認為以最大概似法進行參數估計時，樣本數大於100以上是最低的要求，因為樣本數太少可能導致不能收斂或得到不當的解釋，因此本研究之樣本數是符合學者的建議。

肆、研究結果

一、樣本特徵

在樣本特徵部分，有效樣本以女性(328人，53.3%)居多，男性則為284人(46.2%)；受訪者年齡主要分佈在20至50歲之間，有效樣本418人；居住時間以21年以上最多，有效樣本有162人（佔26.3%）；在社區組織中擔任職位者以沒有佔多數（491人，79.8%）；個人收入每月所得以2～3.9萬最多（205人，33.3%）；房屋權屬以自有為最多（455人，74%）；受訪者教育程度以大學最多（各199人，32.4%）；職業以服務業最多（139人，22.6%）。（詳表2）

二、社區意識量表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在社區意識構面共包含15題測量變數，依據Tartaglia (2006)原始提出的ISCS量表採用三個構面，並將反向題改為正向題。而為達縮減變數的目標，本研究先進行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研究建構的模式3與模式4其模式配適度均較其他模式為佳，模式3為一階驗證性因素，而模式4為二階驗證性因素，針對此模式選取 χ 2值進行目標係數計算，目標係數為1，目標係數值接近1，隱含二階模式可以取代一階模式，得以進行資料縮減（詳表3）：

同時區居民驗證性因素各模式的係數值變化情形詳如圖2。在CFA的分析中，潛在構面的信度多以CR值為依歸，潛在構面的CR值是其所有測量變數信度的組成，用以衡量構念指標的內部一致性，信度越高顯示這些指標的內部一致性越高，Fornell與Larcker (1981)建議CR值最好為0.6以上。同時為兼顧研究構面的收斂效度，以潛在構面的變異抽取量VE值為指標，VE是計算潛在構面之各測量變數對該潛在構面的變異解釋力，若VE越高，則表示潛在構面有越高的信度與收斂效度，Fornell與Larcker (1981)建議VE標準值須大於0.5，由表3呈現居民的社區意識二階模式之構面CR數值介於0.91-0.96，VE值則介於0.78-0.80，同時個別項目對構面的解釋力介於0.67-0.88。所有測量變數皆符合Fornell與Larcker (1981)建議之CR、VE值，SMC值要求也達到多數學者的要求(Bagozzi & Yi, 1988;

表2 樣本特徵

分類	樣本特徵	樣本數	百分比	分類	樣本特徵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284	46.2	房屋權屬	自有	455	74.0
	女	328	53.3		租賃	88	14.3
年齡	30歲（含以下）	69	11.2		借住	29	4.7
	31～40歲	112	18.2		配住（宿舍）	18	2.9
	41～50歲	205	33.3	教育程度	小學（以下）	54	8.8
	51～60歲	126	20.5		國中	87	14.1
	61歲以上	101	16.4		高中職	120	19.5
居住時間	5年（含）以下	129	21.0		專科	99	16.1
	6～10年	115	18.7		大學	199	32.4
	11～15年	102	16.6		碩士	44	7.2
	16～20年	89	14.5		博士	1	0.2
	21年以上	162	26.3	職業	工業/製造業	55	8.9
在組織中擔任職位	是	101	16.4		商業	62	10.1
	否	491	79.8		服務業	139	22.6
					軍公教	73	11.9
					農林牧礦業	38	6.2
	2萬以下	186	30.2		專門行業	31	5.0
個人收入	2～3.9萬	205	33.3		學生	74	12.0
	4萬～5.9萬	109	17.7		家管	57	9.3
	6～7.9萬	32	5.2		退休人員	22	3.6
	8～9.9萬	13	2.1		其他	55	8.9
	10萬以上	23	3.7				

表3 社區意識構面二階驗證性因素之模式配適度指標

二階驗證因素模式	χ^2值	自由度	χ^2值/自由度	GFI	AGFI	CFI	RMSEA
0. Null Model	1468.34	104	14.118	0.70	0.66	0.96	0.17
1. 一階單一因子模式	1453.29	90	16.148	0.71	0.61	0.96	0.18
2. 一階三因子模式（因素間無相關存在）	2079.46	90	23.105	0.73	0.65	0.94	0.17
3. 一階三因子模式（因素間存在相關）	538.03	87	6.18	0.89	0.85	0.99	0.093
4. 一階三因子模式與二階三因子模式	285.36	87	3.28	0.91	0.90	0.99	0.080
建議值	愈小愈好	-	<5	>0.8	>0.8	>0.9	<0.10
參考依據	Hair et al., 2006		Carmines & McIver, 1981; Chin & Todd, 1995; Hair et al., 2006	MacCallum & Hong (1997)	MacCallum & Hong (1997)	Gerbing & Andersoon, 1992	MacCallum Browne & Sugawara (1996)

Fornell & Larcker, 1981; Hair, et al., 2006)，顯示15題測量變數在用來測量居民的社區意識具有良好的信度與效度。另外偏態介於-0.751-0.403之間；峰度介於-0.018-0.684之間，變數絕對值皆符合常態分佈範圍（偏態小於2；峰度小於7）（詳表4）。

三、社區意識量表之配適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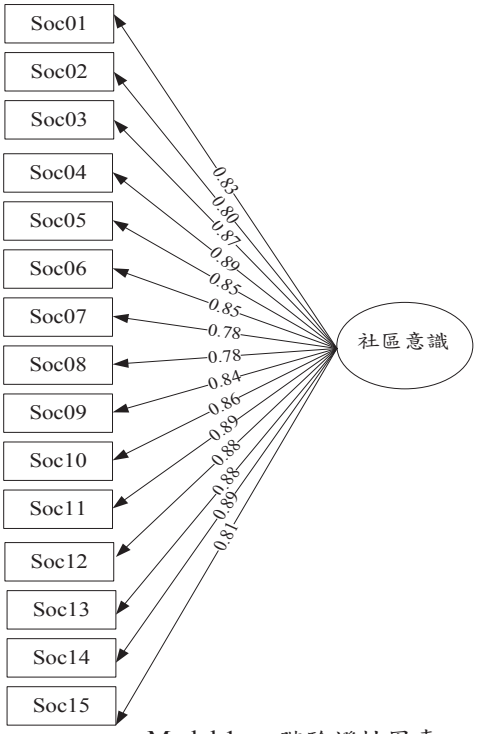
修改後之義大利社區意識量表(ISCS)運用在台灣地區的研究結果顯示分為三個構面的社區意識量表是符合配適度指標的，由於本研究採615份樣本相對較高故*X2*值略高為285.36，其餘各指標：$\chi 2/df=3.28$；GFI＝0.91；RMSEA＝0.08；AGFI＝0.90；CFI＝

表4 居民社區意識二階三因子模式之構面信效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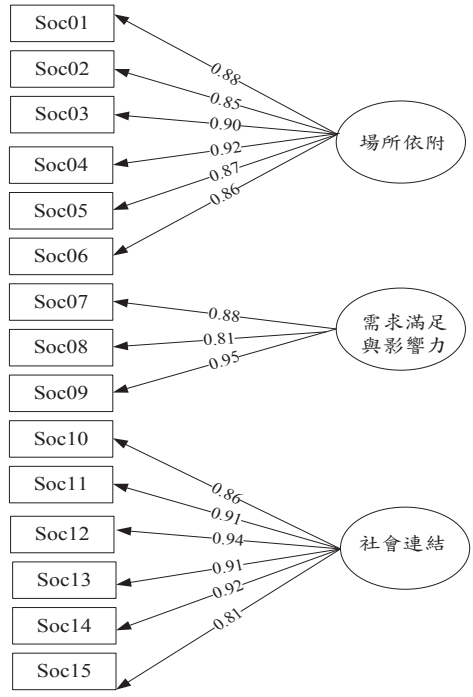
研究構面	測量變數	個別項目信度			常態性		組成信度CR值	變異抽取量VE值
	題目	負荷量	標準誤	SMC	偏度	峰度		
場所依附	我喜歡我居住的社區	0.88	0.30	0.77	-0.555	-0.086	0.96	0.78
	我居住的社區是很美的	0.85	0.37	0.71	-0.403	-0.338		
	我對我居住的地區感到驕傲且願意告訴別人	0.90	0.24	0.81	-0.616	0.029		
	我覺得我是屬於我居住的社區	0.93	0.17	0.86	-0.653	0.268		
	在我居住的社區我覺得安全	0.87	0.30	0.76	-0.492	-0.225		
	我喜歡我住的房子	0.88	0.30	0.75	-0.632	-0.026		
需求滿足與影響力	我住的地區提供我機會去嘗試不同的事物	0.88	0.34	0.77	-0.558	0.372	0.91	0.78
	如果社區能組織起來就能達到所要達成的目標	0.83	0.47	0.69	-0.751	0.684		
	假如我需要幫忙，這個社區能夠提供我幫助	0.94	0.17	0.88	-0.437	0.039		
社會連結	我住的社區裡居民是客氣有禮貌的	0.87	0.31	0.76	-0.466	-0.018	0.96	0.80
	我很喜歡我的鄰居	0.91	0.21	0.83	-0.499	0.073		
	如果有人需要幫助，社區裡的人會願意提供幫助	0.93	0.18	0.86	-0.465	-0.097		
	對於社區的規定我願意尊重	0.91	0.21	0.85	-0.552	0.132		
	在這個社區中很容易可以與其他人建立人際關係	0.92	0.19	0.85	-0.524	0.050		
	假如搬離這個社區我會損失很多	0.82	0.51	0.67	-0.507	0.058		

註：1. 組成信度：（標準化因素負荷量的總和）2 / [（標準化因素負荷量的總和）+標準誤之總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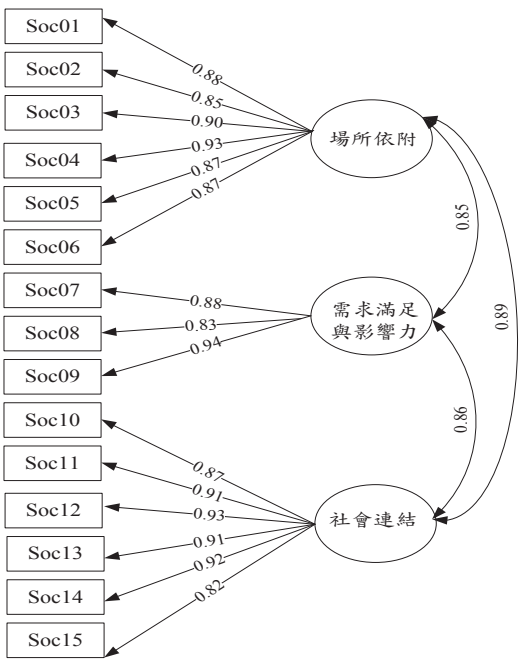
2. 變異抽取量：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平方後之總和/（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平方後的總和+標準誤之總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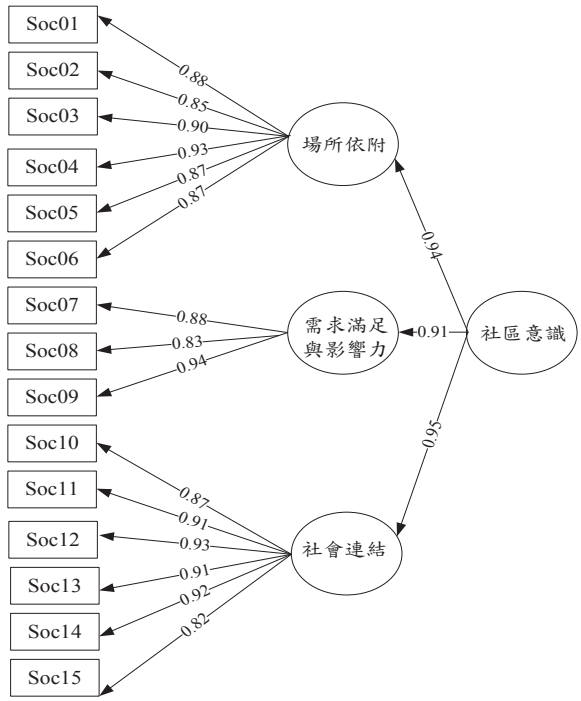
Model 1: 一階驗證性因素



Model 2: 一階三因子驗證性因素
（潛在變項間不存在相關）



Model 3: 一階三因子驗證性因素
（潛在變項間存在相關）



Model 4: 二階驗證性因素

圖2 居民社區意識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

0.99；IFI＝0.99；NFI＝0.98；NNFI＝0.98皆符合配適度指標的理想要求。顯示本研究採用部分修正Tartaglia (2006)義大利的量表亦適用於台灣。

四、社區意識與居民社區參與之關係

為進一步探究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之關係，本研究執行結構方程模式，結果詳圖3，由標準化係數值0.73，顯示屬於正向影響，研究證實農村居民之社區意識顯著影響其社區參與。整體而言，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模式之整體適配指標亦都在可接受的標準範圍內（詳表5）。其中社區參與之問項為三題問項分別是詢問受訪者在參與社區營造中有關環境改造行為的頻率、次數、程度（問項詳表6）。

因此在促進社區居民社區參與上，透過提升其社區意識是有顯著的功效，其中增加其「社會連結」的效果影響最大，所以未來政府在推動社區營造相關政策上，除了從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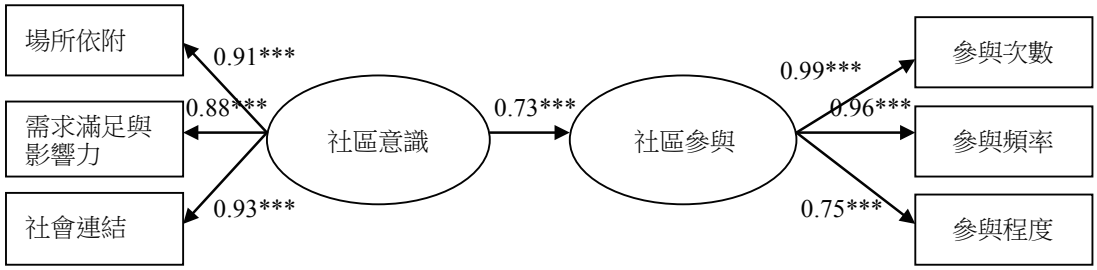


圖3 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關係路徑圖

註：*表P＜0.05,** 表P＜0.01, ***表P＜0.001

表5 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模式整體適配度檢驗結果

指標項目	檢驗值	指標項目	檢驗值
絕對適配指標		增值適配指標	
$\chi^2(df)$	19.79（8）, p=0.10	NNFI	0.99
RMSEA	0.054	NFI	0.99
GFI	0.99	CFI	0.99
AGFI	0.97	IFI	0.99
簡效適配指標		RFI	0.99
PNFI	0.530		
PGFI	0.531		

表6 居民社區參與平均值、標準差、與常態性與信度分析

研究構面	測量變數 題目	平均值	標準差	常態性 偏態	常態性 峰度	Cronbach's Alpha 值
社區參與	我過去參與社區環境改造工作的頻率是	2.72	1.27	0.303	-0.879	0.926
	我過去曾經參與社區環境改造工作的次數是	2.81	1.31	0.256	-1.011	
	我對於社區環境改造工作的參與程度是	2.45	1.14	0.784	-0.116	

註：1. 本量表以李克特5點量表施測；2.參與頻率選項：(1)一年不到一次 (2)一年1-2次 (3)一季1-2次 (4)兩個月1-2次 (5)每一個月一次以上；3.參與次數選項：(1)無 (2)1-2次 (3)3-4次 (4)5-6次 (5)7次以上；3.參與程度選項：(1)從未參與 (2)出席相關活動 (3)會提供意見 (4)參與相關決策 (5)實際參與規劃與執行。

加居民的社區意識著手之外，亦可以增加社區聯誼、提供社區居民更多交流機會等手段來促成居民社區參與。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社區意識一直是社區參與中相當重要的一個概念，政府在推動社區營造政策時皆強調社區的凝聚力，衡量社區居民的社區意識可以瞭解社區的凝聚力，在社區營造工作上可以作為實務上的參考。本研究證實了「場所依附」、「需求滿足與影響力」、「社會連結」三個因素作為社區意識量表的在台灣地區運用的適切度，同時此一量表也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未來相關研究應可運用此一簡單化的量表來量測社區意識，不需重複尋找相關因素再透過探索性因素分析來重新獲取構面。同時也可以再次透過驗證性因素分析驗證此量表之恆等性。

本研究證實了社區意識為影響社區居民社區參與行為的重要因素，此與侯錦雄與宋念謙(1998)、林暉月(2001)、郭瑞坤與王春勝(2004)、黃源協等人(2007)、Chavis (1990)、William與Partick (1989)、陳香妃等人(2007)、鐘政偉等人(2007)的研究結果相符，更說明了提高居民社區意識對於增進居民參與社區營造工作的重要性。但過去研究並未針對社區意識之構面進一步探討與提出相關建議。

透過結構模式也看出農村居民社區意識中「社會連結」這因素是最重要的，顯示農村社區在發展社會連結上著重於人際關係的建立，社區居民的互助。因此也賦予了「水

保局農村再生計畫」、「營建署城鄉風貌計畫」、「客委會生活環境營造計畫」、「文化部社區總體營造獎助計畫」等社區營造政策在強調社會資本的累積獲得理論上的支持。

二、建議

社區意識不僅是學術性的構念，應該可以運用在規劃上的評估。社區營造的成效評估若僅僅著重在測量活動辦理的場次、預算執行率，或是營造點之多寡，並不能適當地瞭解相關政策對於社區心理上的效果，透過社區意識的量測，或許可以提供另一種可行的評估選擇。

本研究證實提升社區意識對於參與環境改造的行為會有正向的影響。如要提升社區意識來看，以McMillan與Chavis (1986)的觀點，社區居民的共同經歷越多，居民的的聯繫更密切，則社區意識亦越提升。此外，郭瑞坤等人(2006)則是建議在培力的過程中強調社區共同價值的內化。另外蔡秀美(2004)指出居民社區活動的參與和個人既有的情感聯繫關係是相互影響的。所以藉由活動的參與，可以增加社會聯繫與事務的參與感，進而強化社區共同意識（郭瑞坤等人，2006）。Francis, Giles-Corti, Wood, Knuiman (2012)也指出參與社區組織也能強化社區意識。以本研究的三個構面而言，場所依附、需求滿足與影響力、社會連結來看，提升居民對社區的場所認同、透過滿足居民的需求，增加互動聯繫都是增加居民社區意識的方式。

在策略上，建議可以從(1)增加居民的場所依附感：(a)針對社區環境劃分責任區共同認養，提升居民對場所的認同；(b)改善社區景觀；(c)加強社區巡守制度以提高社區安全；(d)鼓勵社區參與競賽獲取榮譽感。(2)滿足居民的需求及影響力：(a)透過共同成立工作坊，共同面對解決問題，以凝聚共識；(b)透過強化社區機構的服務性，如公園、圖書館、寺廟、活動中心等，提升居民需求的滿意度；(c)鼓勵居民參與社區組織。(3)強化社會連結：(a)運用社區內外的資源來舉辦各類型活動，增加居民的互動、情感上的聯繫強化；(b)健全社區居民溝通平台例如發行社區刊物；(c)提供社區相關福利補助、互助之資訊。

此外針對社區營造相關計畫，從本研究的結果發現影響社區居民參與社區營造最重要的因素為「社會連結」，社會連結的概念類似於社會資本的累積，所以應從「信任」、「鄰里互動」、「規範價值」這三方面來強化，因此應增進社區居民之間互相瞭解，促進人與人間、群體與群體間的互動，而使社區網絡健全且活絡，資訊及知識的傳承與累積更具成效；在信賴、互信、互助合作的基礎之下，增強社區凝聚力與共識，因此透過政府單位持續推動類似水保局之「培根計畫」應能對於社區營造相關政策落實有顯著幫助。

不同居民居住時間、社會階級、生活型態、培力因素亦是影響社區參與行為的因素，例如李俊豪(2010)的研究發現居住時間長短對個人社區意識呈負向的微弱直接影響力，而非西方文獻所主張之強且正向影響效果，因此本土化之實證研究有其必要性，然本研究受限於篇幅，後續研究建議可以納入探討其影響。另外可以依社區居民之外顯社經背景做交叉分析，以瞭解不同社經背景居民之社區意識高低，以及參與行為之差異。以對於不同背景之居民採取不同之促進社區意識方式，在實務上對於推動社區營造政策應有所助益。

引用文獻

1. 吳宜蓁，(1996)，有線電視公益頻道規劃與社區意識的提昇，台北：電視文化研究委員會。
2. 呂怡儒，(2001)，台北近郊森林地方感之研究，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森林學研究所，台北。
3. 李光中、王鑫，(2003)，社區參與山林守護之管理一個行動研究架構的提議，內政部營建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編，2003國家公園登山研討會論文集，(pp.320-338)，花蓮：內政部營建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4. 李俊豪，(2010)，台灣社區居民之社區意識-系統模式之分析，都市與計劃，37(2)，209-231。
5. 沈桂枝，(2001)，活動型老人之社區參與行為與社會支持之相關研究，碩士論文，國立台北護理學院護理系研究所，台北。
6. 林暉月，(2001)，居民的社區意識與社區公共事務參與態度及方式關係之研究，碩士論文，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高雄。
7. 林瑞欽，(1994)，社區意識的概念--測量與提振策略，社區發展研究學刊，31，1-21。
8. 侯錦雄、宋念謙，(1998)，台中市黎明住宅社區居民社區意識之研究，建築學報，24，51-65。
9. 胡志平、林帝佑(2013)，住宅標籤化與社區意識及維護績效路徑分析-結構方程模型應用，住宅學報，22(1)，81-106。
10. 原友蘭、劉俊志，(2004)，地方依附初探：一個實驗性的測量，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編，第六屆休閒、遊憩、觀光學術研討會論文集，(pp.131-139)，台北：台灣大學。

11. 夏鑄九、林鎩、顏亮一，(1992)，古市街與傳統聚落保存方式之研究，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12. 張凱智、宋秉明，(2010)，社區意識與民眾參與關係之研究-以夥伴關係為干擾變數，觀光旅遊研究學刊，5(2)，51-76。

13. 郭瑞坤、王春勝，(2004)，地區發展相關因素整合居民結構區隔研究，戶外遊憩研究，17(1)，23-49。

14. 郭瑞坤、汪夢怡、邱鴻遠，(2006)，影響大學教師參與社區公共事務因素之研究，公共事務評論，7(2)，135-165。

15. 郭瑞坤、徐依鈴、張秦瑞、沈逸晴，(2013)，社區議題與社區自主關聯之探討，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7(1)，1-39。

16. 郭彰仁、侯錦雄、郭瑞坤、歐雙磐、謝政勳，(2009)，檢視社區居民參與城鄉風貌計劃的計劃行為理論，建築學報，69，137-154。

17. 郭彰仁、郭瑞坤、侯錦雄、林建堯，(2010)，都市與非都市計畫區社區居民參與環境改造行為模式之比較研究-以台灣南部為例，都市與計劃，37(4)，393-431。

18. 陳香妃、張金鶚、葉毅明，(2007)，從集體行動看社區意識與管理制度對公寓大廈管理維護之影響－管理維護客觀績效與社區主委主觀滿意度分析，都市與計畫，34(2)，139-163。

19. 黃富順，(1994)，加強社區意識-建立祥和社會的途徑，社會發展學刊，1，23-33。

20. 黃源協、蕭文高、劉素珍，(2007)，社區意識及其影響因素之探索性研究，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1(2)，1-33。

21. 劉弘煌，(2011)，我國國民的社區意識與鄰里關懷及互動之研究，民生論叢，5，1-41。

22. 劉毓玲譯，(1993)，Osbome, D., & Gaebler, T. 原著，(1992)，新政府運動，台北市：天下文化出版。

23. 蔡宏進，(1985)，社區原理，台北市：三民書局。

24. 蔡祈賢，(1996)，社區意識與社區發展，社會福利，124，21-26。

25. 鐘政偉、賀力行、謝宜伶、陳恒敦，(2007)，地方居民態度對推動文化創意產業影響之研究-以苑裡鎮山腳社區為例，鄉村旅遊研究，1(1)，59-88。

26. Bagozzi, R. P., & Yi, Y. (1988). On the Evaluation for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16(1), 74-94.

27. Brodsky, A. E., O' Campo, J., & Aronson, R. E. (1999). PSOC in community context: Multi-level correlates of a measure of 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 in low-income, urban neighborhoods.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7(6), 659-680.

28. Carmines, E., & Mclver, J. (1981). Analyzing Models with Unobserved Variables: Analysis of Covariance Structure. In Bohrnstedt, G., & Borgata, E. (eds.), *Social Measurement: Current Issues*, (pp.65-115). Beverly Hills, Ca: Sage.

29. Chavis, D. M. (1990). Sense of community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A catalyst for 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8(1), 55-81.

30. Chavis, D. M., Hogge, J. H., McMillan, W. D., & Wandersman, A. (1986). Sense of community through Brunswick's lens: A first look.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4(1), 24-40.

31. Chin, W. W., & Todd, P. (1995). On the Use, Usefulness and Ease of Use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MIS Research: A Note of Caution. *MIS Quarterly*, 19(2), 237-246.

32. Clampet-Lundquist, S. (2010). Everyone had your back: social ties, perceived safety, and public housing relocation. *City & Community*, 9(1), 87-108.

33. Davidson, W. B., & Cotter, P. R. (1986). Measurement of sense of community within the sphere of city.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6(7), 608-619.

34. Doolittle, R., & MacDonald, D. (1978). Communication and a sense of community in a metropolitan neighborhood: A factor analytic examination.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6, 2-7.

35. Fornell, C., & Larcker, D. F. (1981).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and measurement error.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8(1), 39-50.

36. Francis, J., Giles-Corti, B., Wood, L., Knuiman, M. (2012). Creating sense of community: The role of public spac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2, 401-409.

37. Gerbing, D. W., & Anderson, J. C. (1992). Monte carlo evaluations of goodness- of- fit indexes for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25, 186-192.

38. Glynn, T. J. (1981). 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 Measurement and application. *Human Relations*, 34(7), 789-818.

39. Hairs, Jr. F., Anderson, R. E., Tatham, R. L., & Black, W. C. (2006).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6th ed*. NJ, USA: Prentice-Hall.

40. Hughey, J., Speer, P. W., & Peterson, N. A. (1999). Sense of community in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Structure and evidence of validity.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7(1), 97-113.

41. Ittelson, W. H. (1978).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nd urban experience.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0(20), 193-213.

42. Itzhaky, H., & York, A. S. (2000). Empowerment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Does gender make a difference? *Social Work Research*, 24(4), 225-234.

43. Long, A. D., & Perkins, D. D. (2003).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index and development of a brief SCI.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1(3), 279-296.

44. MacCallum, R. C., & Hong, S. (1997). Power analysis in covariance structure modeling using GFI and AGFI.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32, 193-210.

45. MacCallum, R. C., Browne, M. W., & Sugawara, H. M. (1996). Power analysis and determination of sample size for covariance structure modeling. *Psychological Methods*, 1, 130-149.

46. McMillan, D. W., & Chavis, M. D. (1986). Sense of community: A definition and theory.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4(1), 6-22.

47. McMillan, D. W. (1996). Sense of community.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4(4), 315-325.

48. Md Sakip, S. R., Johan, N., Abdullah, A., & Mohd Stalleh, M. N. (2013). Assessing sense of community dimension in residential areas in the Malaysian context.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05, 655-663.

49. Ohmer, M., & Beck, E. (2006).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neighborhood organizations in poor communitie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neighborhood and organizational collective efficacy.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elfare*, 33(1), 179-202.

50. Paul, S. (1987).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ment projects: The World Bank experience. *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 No. 6*. Washington, DC, USA: World Bank.

51. Perkins, D. D., & Long, D. A. (2002). Neighborhood Sense of Community and Social Capital: A multi-level analysis. In A. Fisher, C. Sonn & B. Bishop (eds.), *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 Research,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pp. 291-318). New York: Plenum.

52. Perkins, D., Florin, P., Rich, R., Wandersman, A., & Chavis, D. M. (1990). Participation

and the social and physical environment of residential blocks: Crime and community context.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8(1), 83-115.

53. Peterson, N. A., Speer, P. W., & Hughey, J. (2006). Measuring sense of community: A method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actor structure debate.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4(2), 453-469.

54. Rappaport, J. (1981). In Parise of paradox: A social policy of empowerment over preven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9(1), 1-26.

55. Renn, O., Webler, T., & Wiedemann, P. (1995). *Fairness and competence in citizen participation: Evaluating models for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London, UK: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56. Sheng, Y. K. (1989).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low-income.housing project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25(1), 56-65.

57. Tartaglia, S. (2006). A preliminary study for a new model of sense of community.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4(1), 25-36.

58. Unger, D. G., & Wandersman, A. (1985). The importance of neighbors: The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components of neighboring.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3(2), 139-169.

59. Warzecha, C, A., & Lime, D. W. (2001). Place attachment in Canyonlands National Parks: Visitors' assessment of setting attributes on the Colorado and Green Rivers. *Journal of Park and Recreation Administration*, 19(1), 59-78.

60. William, B. D., & Partick, R. C. (1989). Sense of communit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7(2), 119-125.